

文学创作探秘

杨品 王君 著



- 理论探讨
- 节与审美
- 格与模式
- 术：冒险者的乐园
- 作家与作品
- 烽的生平与创作
- 史氛围与多元性格
- 从表层感觉到深层思辨
- 批评的理论与方法
- 谈批评家的灵感
- 逆向思维与文学批评

华艺出版社

文学创作探秘

杨品 王君 著



华艺出版社

文学创作探秘 **杨品 王君著**

出版发行: 华艺出版社 开本 787×1092 1/32

社址: 北京朝内南小街前
拐棒胡同一号 字数 251 千字

邮政编码: 100010 1991 年 3 月第 1 版 1991 年 4 月
第 1 次印刷

制版印刷: 山西日报印刷厂 印张 11.59 印数: 1—2000 册

ISBN7-80039-439-5 / I · 207 定价: 3.90 元

作者简介

杨品，本名杨占平，1956年12月生，1977年考入山西大学中文系，1982年毕业，分配到山西省民政厅工作，1985年调到山西省作家协会《批评家》编辑部任编辑。



王君，本名王秋君，1959年3月生，1977年考入山西大学中文系，1982年毕业后分配至山西省政协工作，1990年调到山西省工商联，任组织宣传处副处长，负责《当代山西商会》的编辑工作。



序

李国涛

杨品、王君二位都是三十岁刚过的青年评论家，但是他们合作写文章大约已近十年。十年来，他们合作得很好。其实在读大学的时候他们已经是研究当代文学的伙伴，同在一个研究小组里。也就是在那时候，他们的研究能力，他们对当代文学的浓厚兴趣和他们对晋绥根据地作家的见解，已经引起本省专家们的注意。后来，杨品调到山西作家协会当编辑，算是正式干起这一行，而王君仍在行政工作的行当里，不过与山西作家们的接触也就多起来。大约在1985年以后，他们的评论文章发表得越来越多，引起文学界的重视。

我很钦佩他们二位在这么一个枯燥、费力的领域里艰苦跋涉，互搀互扶，直至有所成就。我十分高兴地见到他们论文集的出版！

翻翻这二十多万字的论文，极少泛泛之论。要夸为篇篇精彩，也许有过誉之嫌；但是要说每篇都是下过研究的辛苦，都不乏独立的

见解，可以说是大体公允的。而且我们认为杨品、王君二位为文坦率，敢进忠言，不随人言，是很可贵的。《青年批评家的一种危机》向他们的同辈人提出恳切的忠告，虽然短短一篇，写于“浮躁”之气甚浓的1986年，也算一种针砭。《关于汪曾祺小说评论的评论》见解新颖，采取一个新的角度看问题，我虽然不一定完全同意他们的见解，但是却也认为提出一个值得进一步思索的问题。对1988年的文学评论状况，他们的论点表现在那题目上，就是——《多视点 无秩序 少深刻》，似乎可以说这是一个很不错的概括。以上，仅仅举出三个小例来说明杨品、王君文风的一斑。

这个集里的评论文章，是以山西作家为主要对象的。除了具体的作品评论以外，有《马烽的生平与创作》，有《胡正论》、《冈夫论》和《张平论》，这都是经过系统研究而写出的大块文章。我以为青年评论工作者是应该下力气写几篇作家论的，这对评论家掌握某些系统的材料，训练自己分析问题的能力大有好处。杨品、王君从研究晋绥根据地的文学入手及于今天山西创作的状况，可以说是“立足山西”了，同时他们评贾平凹的《浮燥》，评浩然的《苍生》，评王蒙的《活动变人形》，足见他们又不把自己的眼光局限在山西，（前面说到他们还研究了关于汪曾祺的评论），这正是一条

坚实而艰苦的道路，他们走得很顺。

杨品、王君的评论写得实在，不弄玄虚。但是他们并不固守以前教授们传授的知识范围，他们广泛阅读，努力吸取，他们的眼界是开阔的，兴趣是多方面的。如果说，谈福克纳的那篇短文（《现代派与乡土人情》）尚是浅谈，那么《猜测：文学批评的一种形态》却是细读了一些接受理论、阐释学以后才能提出来的见解。可见，他们的学习是很用功的。

我同杨品、王君都很熟悉，常在一起闲谈。因为我的年岁比他们大得多，谈的时候总是我谈得多，他们谈得少。看来他们都少言寡语。现在他们把厚厚一本书的校样拿来了，摆出了真货色，那么多，竟使我吃了一惊。原来这是两位说得少、写得多的人。我了解一番才知道，他们写的东西更多，这里只收了一部分，他们对自己的作品筛选很严。这同他们二人的整个文风和作风是一致的。

写评论也是“文如其人”吗？我想是的。此书便是一例。

1991年2月24日

目 录

• 理 论 探 讨 •

对创作主体与生活客体关系的一种理解	(2)
文学的使命与读者的审美感受	(14)
商品经济格局中的当代文学	(22)
对文艺作品时代感的再思考	(28)
“改革文学”与改革意识	(32)
情节与审美	(36)
风格与模式	(40)
重复的艺术 艺术地重复	(45)
艺术：冒险者的乐园	(49)
农村题材小说的走向	(52)
面对“中国潮”的报告文学	(63)
作家要耐得住寂寞	(68)
作家的探索与空虚	(71)
作家的“追求”与作品的价值	(74)
作家职业的危机	(78)
现代派与乡土人情	(83)

• 作 家 与 作 品 •

马烽的生平与创作	(89)
----------	--------

马烽与美术	(105)
马烽、孙谦和乡下人	(107)
——从电影《咱们的退伍兵》谈起	
对历史的思索和评判	(110)
——马烽新作《葫芦沟今昔》读后	
对马烽新时期创作的思考	(114)
胡正小说的艺术特色	(126)
读《几度元宵》	(132)
胡正论	(141)
冈夫论	(159)
认知模式和审美意识的重构	(171)
——评焦祖尧的短篇新作	
顾莹的系统性格	(181)
——读柯云路的《一个系统工程学家的遭遇》	
女人的悲剧与文化的思考	(186)
——评张石山的《舍玉儿》《甜苣儿》《迎灯儿》	
历史氛围与多元性格	(199)
——读张平的《梦中的情思》	
张平论	(211)
渗透着个性的笔耕	(223)
——从《二姐》看张平家庭系列小说的艺术追求	
从普通生活中发掘深意	(238)
——谈崔巍和他的短篇小说	
从表层感觉到深层思辩	(244)
——由《圆寂的天》谈吕新创作的转换	
质朴而耐人寻味的《老王》	(251)

《活动变人形》的理念化倾向	(256)
主体意识的高扬与低文明层次的不谐和	(269)
——贾平凹《浮躁》漫评	
厚实、真诚的力量	(281)
——浩然《苍生》的魅力	
个值得玩味的悲剧故事	(293)
——读《遥远的白房子》	
逾越的追求	(299)
——读《晋阳文艺》小说特辑	
她们试图摆脱附属物的命运	(303)
——读《火花》三月号女作者小说	

• 批评的理论与方法 •

谈文学评论中的个性意识	(310)
谈批评家的灵感	(319)
逆向思维与文学批评	(326)
猜测：文学批评的一种形态	(331)
通俗文学的现状与批评的契机	(341)
开拓思维空间与采用科学态度	(344)
青年批评家的一种危机	(348)
关于汪曾祺小说评论的评论	(351)
多视点 无秩序 少深刻	(356)
——一九八八年文学评论管窥	
对评论和创作“脱节”的理解	(361)
后记	(364)

理 论 探 讨

对创作主体与生活 客体关系的一种理解

文学创作活动是客观世界与作家主观精神对立统一的运动，具体说来就是，客观世界经过作家心灵的过滤、发现和创造进入文学，成为一种新的世界，然后再反作用于读者的精神。然而，长期以来，人们并未准确地解释两者的关系和相互作用，或者是侧重于从客体的角度来界定创作的特点，强调再现的作用，强调存在是主导；或者是侧重于从主体的角度来揭示创作的规律，强调表现的作用，强调精神是主导。两种观点都可以找到自己的立脚点，找到注释的作品。生活客体再现论的观点曾一度占优势，作家深入生活只能是到基层去与工农兵摸爬滚打在一起，忽视作家主体意识、文化素养、感情机制的作用。近年来，创作主体表现论的观点终于找到了自身发展的条件和环境，于是便大声宣称：“只要有扎实的生活，就能写出好作品”的说法是不符合创作的根本规律的，成功的秘诀只依靠文化素养的提高、主体意识的强化、创作手法的多样诸因素。于是又出现了不少作家生活底蕴空虚，作品重复、雷同、玩弄技巧等现象，拉大了与人

民群众的距离，丧失了读者。

我们认为，客体再现论和主体表现论都说明了文艺创作的某些规律，但又有各自的偏执。如何把二者的对立统一关系处理得恰到好处？这正是在文艺创作上和理论探讨中值得认真思考和解决的课题。

单向生活再现论的局限与生活的不可否定性

无庸置疑，客观生活在任何时候都是作家创作的本源，没有生活便没有文学，就没有作家对生活审美体验的表现性形式。但是，我们又不能不看到这样一个事实：从50年代初到80年代初的三十多年里，文学创作理论只有单向的生活再现论一个方面，不管是蔡仪主编的《文学概论》还是以群主编的《文学基本原理》，都只强调文学创作是社会生活的反映，作品是社会生活在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文学是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此说将非常复杂的问题简单地套入物质决定精神、存在决定意识的哲学本体论中，消融了文学创作的特点与个性，也违反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关于客体与主体互相作用的观点。因此，在那个时候，题材决定论、典型是生活的本质概括论、世界观决定创作方法论、政治标准第一论等等，都带有强烈的单向决定论色彩。这些论点的局限性，使那个时代的不少作家的创作有着明显的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不少作品，包括一些能够被列入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作品，也基本上是生活现象和方针、政策的图解。

客观地说，再现论创作观是坚持了唯物主义基本原则的，它们指出生活是文学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

从一定意义上揭示了文学作品作为意识形态的外在本质和外部规律。这种观点坚持世界物质统一性原则，是有其合理性的。只是它过分强调生活客体对创作的规定性，以致忽略了创作的主体功能，使文学创作理论停滞在亚里斯多德的“摹仿说”阶段。很显然，仅用这种理论来说明文学创作的内在本质和内部规律是缺乏力量的，有时甚至是悖谬的。

我们从另一个角度考察，再现论创作观提出创作反映生活的真实性、生动性、典型性和普遍性要求，是注意到了反映的能动性的。但是，这种能动性只是承认在客体规定性前提下主体具有有限的灵活性，创作主体作为反映生活客体的一种形式只能微弱地作用于它的内容。也正是在这种近似机械反映论的观念支配下，多年来一谈创作，就只强调作家的生活积累，把对生活的拥有量和创作成功率作简单的类比，使文学创作陷入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即使一时被捧得很红的生活翻版式的作品，转眼间也成了昨日黄花。一旦一部作品引起人们的注意，便被冠之为再现生活的“结晶”、“硕果”；面对这样的“赞誉”，不仅使作家以后的创作难以创新，也给理论批评界带来以生活衡量艺术的线性思维的恶果，落入恩格斯所尖锐指出的“把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肉体对立起来的、荒谬的、反自然的观点”（《自然辩证法》第159页，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之中。

马克思主义认为，同客体相对的主体是认识者，也是实践者和评估者，它不是消极无为地适应客体，而是通过实践能动地认识、评价和改造客体。由此，我们认为，文学作品所表现的已不是生活的原型，而是生活的变形，生活在其中只是充当表现作家创作意图的某种材料和物态载体，客观现

实只有经过作家这个中介变成心灵现实，才能成为作品的内容。近年来取得较大成就的著名青年作家贾平凹的“商州系列小说”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贾平凹笔下的商州，已经不是现实中的陕西商洛山区，而是主体化了的心灵现实。所以，他在长篇小说《浮躁》的《序言》中说：“在这里所写到的商州，它已经不是地图上所标志的那一块行政区域的商州了，它是虚构的商州，是作为一个载体的商州，是我心中的商州。”

当然，我们指出单向生活再现论的局限，强调主体意识的觉醒以及强化，并不是全盘否定深入生活，抹煞生活在创作中的作用。现实生活永远是文学作品得以诞生的母体，然而，正如每个作家能有各自不同的创作风格一样，深入生活的方式上也各不相同，不必也不可能强求一致。有些作家感到自己不到基层、不接触具体的人和事，就写不出作品来，那就应该鼓励他们下去，并为他们创造条件。象湖南、山西、陕西、河南等地的党政领导部门，就把一批近几年来崭露头角的中青年作家安排到县、乡或工厂、企事业单位兼职，以便深入生活。也有些作家认为自己在正常的工作、生活和交往中，凭借敏捷的思维也可获取创作素材，写出成功的作品来，那就不一定非让他们离开自己熟悉的环境而到陌生的地方去。象北京、上海、天津、广东等地区的一批著名作家如王蒙、从维熙、邓友梅、蒋子龙、冯骥才、王安忆等并没有下基层去兼职深入生活，但也不断有佳作问世。正如列宁说的：“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每个人都有自由写他所愿望写的一切，说他愿意说的一切，不要任何限

制。”（见《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红旗》杂志 1982 年第 22 期）文学创作是一种个性自由和主观选择程度很高的思维活动，只要作家能避免单向的生活再现论的局限，多角度、多层次，主体地、多元地揭示生活的本质，就应当尊重作家自由地选择深入生活和表现生活的方式方法。

创作主体论的积极意义及强调的偏颇性

近年来，文学界关于创作主体的论争，不啻是一个强有力冲击波，它的作用和影响完全可以提到推动我国文学发展的高度来认识。实际上，这一理论的出现，也是理论界对我国这几年作家创作的精神状态的深刻反思和高度概括。新时期的文学实践给人们的重要启示是，文学作品作为作家的创造物，是作家对现实生活能动的创造性的审美反映，是作家自身气质、禀赋和个性的自我表现。在作品的创作过程中，主体性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作家可能是为了维持自己的衣食住行的需要而写作；可能是为了使自己在社会上找到一个安稳的位置而写作；也可能是为了阶级、民族、国家的利益或提高全人类文化水平而写作。英国著名美学家阿诺·理德说得很中肯：“究竟是什么东西推动艺术家进行创作的呢？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所有的一切。艺术家进行创作的动因，这包括了他过去所有的生活状况，他在创作时的身心状况、意识和气质，包括所有能引起灵感现象的一切情况，这些情况严格说来，可以包括直到艺术家所描写的那件事情为止以前全部宇宙的历史。”（《美学译文》丛刊第 1 辑第 90 页）。新时期中青年作家正是认识到了这一点，才敢于超越对现实生

活的直观描摹和政治观点的机械图解，从生活的感性、知性层面上升到历史的、哲学的、美学的深层结构，并向民族性格和心理积淀层作深广的探究和开掘；从单一的政治功利观念进入广阔的社会人生思考；从客观叙述故事的观念拓展为立体地表现人的主观心灵世界的观念；并且随着我国的对外开放，越来越注意横向吸收，引进了象征主义、意象主义、结构主义、精神分析主义、魔幻现实主义、黑色幽默、新感觉派、荒诞派、意识流等创作方法，呈现出异彩纷繁、扑朔迷离的局面，开放的、全方位的创作态势正逐步形成。

如果进一步分析，我们感到，创作主体性不仅表现在作家对生活客体的一般能动反映上，更重要的是表现在主体对客体的改造和创造上。文学作品的本质是创造与表现经过作家心灵化了的客观现实。比如张承志《北方的河》，客观的描写已被主观的感觉所代替，外在的大自然已经转化为人的内在的情绪。流进小说中的北方四条大河，已经不单单是人物所处的外部空间的背景。“河”诗化了，甚至是音乐化了。这里，主体与客体、人和自然之间的空间界限消失了，人与河合而为一，“河”完全主观化、抒情化了。“河”象征着北方大地的命运；象征着我们古老民族的历史和未来。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文学创作既是一种再现生活、认识生活的活动，更是一种主体创造生活的活动，是再现、认识和主体创造的统一体。

我们在强调创作主体论积极意义的同时，也要防止只重主体、忽视客体的倾向。事实上，近年来已经有一些同志在理论探求时因情绪急切而造成理论上的偏颇。他们认为，只要作家感应生活的能力强，就是“生活积累相对贫乏”，也能